

构出版,平均每家出版科技期刊 1.3 种;德国 2110 种科技期刊,由 715 个出版机构出版;法国 810 种科技期刊,由 348 个出版机构出版;英国的 4323 种科技期刊由 1019 个出版机构出版。调研发现,国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真正做大做强的,出版 100 种以上期刊的是非常少的,即使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大出版集团也是屈指可数的。

发达国家向来对于中小型出版社有着非常明确的倾斜政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大型集团垄断出版市场的现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正是出于保护中小出版企业的需要和对超级出版集团妨碍自由竞争的考虑,法国文化部图书与阅读局每年都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植、帮助中小出版社和中小书店,帮助他们对付大型出版集团的竞争;加拿大政府为了保护 and 促进本国出版业的发展,不受美国等出版集团的挤压,遗产部文化产业司每年都向加拿大全资拥有的出版社提供必要的资助,以扩大其出版物销售市场。各国政府一般通过《垄断法》来限制和规范大型出版商的经营行为。政府通过仔细、慎重的审议,才会批准大型公司的并购。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并购会造成市场垄断,从而危及其他竞争者或最终消费者的利益,将有权予以阻止。如,德国出版商贝塔斯曼收购美国兰登书屋是通过了国家审批的。而 1997 年时,ELSEVIER 曾试图与 KLUWER 集团合并,创建世界最大的专业性科学出版集团,因政府反对而未获成功。

从国外经验来看,国家只需要重点扶持几个大型的出版社,帮助其做大做强并冲击世界水平足矣,没有必要要求其余所有出版社都用集团化、集约化方式办刊。

目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有百种以上学术期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旗下有将近 200 种学术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期刊。从政策层面上鼓励和扶持这样的大型出版机构集团化办刊,推动其产业化、集约化发展,可为我国科技期刊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同时,也应支持和鼓励小型出版机构出版有特色的专业学术期刊,保持科技期刊出版界的生态平衡。在此基础上,以国家精品科技期刊平台的方式,向世界推送和展示中国的优秀科技期刊,无论其办刊单位的规模是大是小。

第四,政府应考虑对科技期刊的税收支持。

发达国家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及中小型出版机

构进行资助,对图书进出口,尤其是出口进行补贴和资助。减免税收是国外多数国家扶持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对出版物一直采取零税收政策,法国、瑞士、西班牙等只征收极低的出版税。美国政府将大学出版社归类于非营利出版机构,因此在税赋方面也有一定的优惠或减免。多数国家出版物的税率比一般商品低得多。另外,一些国家对出版物设置关税壁垒,出口免税,进口加税,还有鼓励期刊出国参展等政策。

我国目前对科技期刊出版业的税收政策是先征后返,与国外相关措施比较起来,这个政策至少增加了一些工作环节。对于非营利性的科技期刊,完全可以考虑实施一步到位的减免税收政策而不是先征后返。

第五,通过政策调控,把优质办刊资源留在国内。

对于办刊有特色且经营良好的科技期刊出版机构,有余力申办本学科新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审批时可给予优先对待,加快审批流程,鼓励其创办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这样可以避免目前一些学术期刊为对付“审批难、审批慢”的头疼问题而寻求海外注册的作法,把更多的优秀办刊资源留在国内。

对于期刊出版体制的改革来说,要“坚持新闻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个纲,可以采取不同的办刊方式和机制体制。“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哪种办刊方式,都能够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 唯有源头活水来

### ——我亲身经历的科技体制改革

张碧晖(原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科技体制改革和任何改革一样,要做的事情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制度建设。作为科学学学会的老成员,我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热潮;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科委主任兼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负责人,我认真投入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

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首批学会成员除了引进和介绍这门学科外,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科学精神、提倡

科技管理以及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当时党中央号召要认识新技术革命的形势、研究我们的应对措施。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激荡的百年史》、《有效的管理者》等著作。学会的成员们纷纷以讲师团的名义,在各地宣讲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我们的对策。我除了在湖北省各地巡回演讲外,也参加了学会在有关省部的演讲,如参加了福建省委组织的报告会。当年,我们在宣讲奈斯比特《大趋势》中“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以及“知识网络”时,谁能想到今天全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政治、经济、军事、国家安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2007 年在吴明瑜同志推荐下,由我和奈斯比特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发展的对话,随后奈斯比特将新著《定见》签名后送给了我。

1986 年 7 月,在国家科委于北京召开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做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我和几位学会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些筹备工作,会后也都纷纷著文,宣传软科学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对决策的科学化与管理的现代化的重要性。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曾被聘为中共湖北省委特约研究员和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作为智库成员出了一些点子,多数领导还真重视专家的意见,例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就是省市主要领导广泛听取了专家意见决心成立的。不少领导也能听取批评的声音,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说武汉市在改革开放上“醒得早,起得晚”,《长江日报》就登在头版上。后来一位主要领导还加了一句,“又睡了一个回笼觉”。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后,我们得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对这个会很重视,曾用放大镜分几次看完万里的报告,就由田夫等五位同志向陈云同志写报告,要求成立带有智库性质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陈云同志批示后,决定走民营道路,从体制上进行了探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1989 年 5 月我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同志参加了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科技园学术会议,这是我国代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在美国讲学的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院长韦钰教授也列席了会议。我们除了在硅谷考察外,还应世界科技园主席邀请,参观了设在凤凰城的世界科技园总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

重要方面。一时间,全国各地兴办科技园区风起云涌,为放活科技人员、放活科研院所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成绩是很大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地方并没有搞清科技园的真谛。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开会时,做主报告的竟然是该校的土地管理处长,这说明开发区主要是要优化环境。早在 1985 年,我听说国家科委领导正在寻找一本《剑桥现象》的书,就利用赴英开会的机会,通过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马凯教授找到了,回国后组织翻译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对大学与科技园的关系以及促进青年人创业都说得很清楚,不过可惜大部分的大学领导都不知道有这本书。毋庸讳言,我们开发区存在拼政绩的现象不算少,有的科技园区热衷于提这个“谷”那个“谷”,有的把国有大企业的产值也算自己开发区的 GDP。

1990 年,我任武汉市科委主任,在前任的基础上,认真抓技术市场、科技贷款、成果转化,放活科研院所,组织科技人员进入经济主战场等常规工作外,我们还进行了科技成果拍卖即类似现在的知识产权交易、试办科技投资公司。我们设立了支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年轻人的“晨光”基金,支持强度超过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基金。在国人尚不知道何为工业设计时,我们于 1992 年就召开了工业设计国际讨论会,举办“武汉 CAD 年”。我们通过努力,将培育技术经纪人,写入市党代会主报告。我们严格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确立项目和奖励中,尊重同行评议。科委干部不允许参加到课题组中,也不允许参加课题承担单位组织的出国考察,因而那几年没有出现违法违纪事件。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有一位记者将这些讲话拼凑起来变成一篇文章。文章说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科技优势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市场经济不相信你,并以“丽珠得乐”为例,这个本来是自己开发的产品,却在沿海形成产业,为何我们不得“乐”,出现了我们技术支持沿海、但沿海产品占领本地的局面?文章发表出来,老百姓还很认同,但领导不高兴,认为否定了大好形势。

1992 年 2 月 18 日,邓小平同志南巡第一站在武昌车站,那天恰巧我也去武昌车站,我是去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小平的车刚走,宋健乘坐的车到了。宋健同志从湖北省党政领导那里知道了小平的谈话,也就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还对我说“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就下海去干干”。经过一年多思考,我终于 1994 年正式辞去武汉市科委主

任职务,到广东去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54 岁闯广东,把自己搞活,也算有点勇气吧。

回顾 30 年科技体制改革,应该反思一些盲目的做法,更加自觉地按科学发展规律,进行制度建设。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大谈创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提出要建成创新型城市。更有甚者,有的甚至要打造一千多个乔布斯式的人物。这本身就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平庸的“山寨”文化。去年一位校长用网络语言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受到热捧后,今年好几个甚至名牌大学校长也东施效颦,但引来一片嘘声。正如报刊批评的,“陈陈相因者众,特立独行者少。”科

技上的创新,从源头上看,是科技人员的好奇心,是追求未知的冲动。创新就是超前,是与众不同,是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科技史证明这种人往往特立独行,言行怪僻,甚至被认为是异类。对这样的人,公众要宽厚,单位要宽容,政府要宽松。不宽厚、宽容、宽松,他们的闪光的创新想法,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出的 3T 理论,即人才、技术、宽容,并且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用宽厚、宽容、宽松进行制度建设,放活科技人员,放宽科研院所,是科技体制改革永恒的主题。

(上接第 1864 页)

- [36] Eun J H, Lee K, Wu G. Explaining the “University – run enterprises” in Chin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iversity – industry relation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 1329 – 1346.
- [37] Kroll H, Liefner I. Spin – off enterprises as a means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 a transform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China [J]. *Technovation*, 2008, 28: 298 – 313.

- [38] Churchill G A Jr.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better measures of marketing construc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9, 16: 64 – 73.
- [39] 张延峰. 战略联盟中信任、控制对合作风险的影响及其组合绩效研究 [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40] Malhotra D, Murnighan J K. The effects of contracts on interpersonal trust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2, 47: 534 – 559.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tro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university – industry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LI Shi – chao<sup>1</sup>, SU Jun<sup>1</sup>, LIN Nan<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Financial &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transfer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is paper subdivides control methods into behavior control and output control, open the relationship black – box of control method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dustry – university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verified with the large data sample apply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he effects of behavior control and output control on the transfer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y – university cooperation, essentially featuring knowledge flow and sharing, should focus on behavior control and be assisted by moderate output control to replace the contract design methodology which used to overstress strict output control.

**Key words:** university – industry cooper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behavior control; output control